202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特刊

2022“十大考古”背后的故事

张小筑 郭晓蓉

百余名专家代表线下参会，一众大咖与各项目发掘者齐聚一堂，考古界顶流活动“十大考古”终评会精彩纷呈。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场活动背后的故事，作为“十大考古”活动的主办方，在此用我们的视角讲给大家听。

修订章程细则 更好发挥专业支撑作用

党的二十大系统部署了“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点任务，这是新时代考古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全社会对考古发现和文化遗产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始于1991年，至今已开展了33届，从最初的单路监续，到如今的行业高度认可、公众高度关注，这项活动已被塑造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品牌。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征求了多方意见建议，再次对活动章程和细则进行了修订。

此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参评项目条件、参评资格、评选程序、终评评委产生方式等内容，将相关管理要求写入章程，进一步规范评选审批流程，并根据实际情况更新了评审委员会专家库，细化了专家库管理要求，更好发挥专业支撑作用。

2023年是新修订章程和细则施行的第一年。推介活动办公室严格按照新的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2022年的中国考古故事 “十大考古”背后的139个日夜

2022年是中国考古事业各项工作可圈可点、亮点纷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就的一年。中华文明探源第五阶段研究、“考古中国”18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54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实施，1432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高效开展，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以更加生动的笔触，描绘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从2022年11月10日活动启动，到2023年3月28日发布会结果揭晓，历时整整139天。

活动启动后，推介活动办公室共收到32个项目的申报材料。所涉及申报项目时间跨度大，上起距今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下至长城考古重要发现明清时期的陕西靖边清平堡遗址。从遗迹类型上来看，遗址种类多样且内涵丰富，不仅包括坐落在黄土高原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长江下游的凌家滩遗址等大型史前聚落，还包括商周、两汉、元代的贵族或家族墓葬，以及城址、冶炼遗址、窑址、古港遗址、佛寺遗址等。均从考古学视角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各民族及地域文明的汇聚流动与血脉交融。为了及时推介各考古项目，深入解读考古新成果，“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从2月6日起，连续16天推送32项参评项目的详细资料。

参评项目名单确定后，推介活动办公室随即制作初评选票，2月3日，226张选票（91张全国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团体票和135张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理事个人票）全部寄出。截至2月17日，全部发出选票悉数收回，评委参与率高达100%。2月27日，初评结果产生，22个项目入围终评。“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从3月15日起，连续11天推送20项参评项目的详细资料。

用心用情设计 彰显“十大考古”排面

参加此次终评会的代表，都能对会上分装资料的帆布纪念袋印象深刻。据设计者介绍，这次设计经过不断筛选、打磨和推敲，所有文字的纹样均出自参评项目的元素，其中“十”字的纹样来自陕西西安太平遗址以及新疆奇台唐朝城古城遗址，“大”字纹样来自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左右两侧底纹来自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葬，“古”字纹样选自西藏曲水温江多遗址、山东济南元代张荣家族墓地。下面的地名堆叠为所有参评项目所在地。除帆布袋外，终评会手册的封面也别出心裁集合了各种考古工具的图案，并特意印刷了大号字版本，以方便专家阅读。

入围终评项目单位提交的精美海报也是亮点之一。张张海报突出了遗址最重要的发现，结合精心设计、完美布局，甚至不少遗址已经拥有了自己的slogan，比如“中国百万年人类史新的考古实证”“惊现史前结构最复杂城门”，再比如“武陵炉光”“千年商港、海丝节点”。除了精美海报，还有蓄力于震撼的视频，遗址的千年历史与内涵浓缩在短短3至5分钟内，特效与干货并存、时空交错、见物见人，充分展现了遗址的丰富内容，足见考古人为自己加油打call的干劲十足。

媒体联动优势互补 内外宣传持续发力

在本次“十大考古”终评会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提早开启了“十大考古”预热环节，终评系列和相关报道自3月25日起在新闻频道正式亮相，3月25日至27日连续推出27个入围终评项目展播，朝闻天下、新闻30分、东方时空、新闻联播、直播间、4套中国新闻等滚动播出。频道首发25条节目，重播上百次，总时长200分钟。学习强国文化频道推出“聚焦202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题。

推介活动办公室依托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发挥全媒体优势，通过新技术搭建新平台，实现多种形式的内容产出，并进行融合创新传播，带来更及时、更精彩、更多样的报道。全媒体时代的报道，采访方式和展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充分发挥“一次采集、多次发布，多元呈现、多媒传播”的功能，全流程紧密协同、高效运转，“报、网、微、端、屏”无缝衔接、互为补充，视频、长图、图文等融媒体产品各展其长。融媒体矩阵联合发声。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开设“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题，设置“活动动态”“入围项目”“项目视频”等专栏。

“十大考古”汇报会和发布会在央视新闻、新华网、学习强国、国家文物局视频号、抖音平台、百度百家号、官方微博、中国文物报社新媒体平台矩阵等几十个平台上进行直播，让不能来到现场观摩的听的考古人、考古爱好者能及时分享到“十大考古”终评会的精彩内容。

微博互动，有声有色。多个微博账号共同建立#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微博话题，与网友分享互动。带动了以微博话题、头条话题为代表的千万级阅读量。阅读量超过1000万的有2个，阅读量超过100万的有11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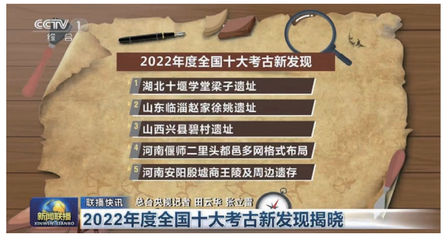
“十大考古”结果刚一宣布，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和“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登上当晚《新闻联播》，社会关注度极高。央视新闻、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普法等公众号发布的推文，突破十万加的阅读量。此外，160多个微信公众号推送“十大考古”相关消息。

3月28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登上中国政府网。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等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终评会及发布会直播观看量，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话题阅读量超过5亿。

中国文物报社正全力做好本届推介活动各项工作的同时，发挥国家文物局文物新闻宣传国家队、主力军的优势，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深化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系统性认识，大力拓展推进社内、社外媒体融合，加强内容原创体系、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系统化建设，有效提升了文物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贺/摄



会议现场 周民/摄

『十大考古』深度解读

新百年 新发现 新坐标 新起点

——2022年度中国史前考古重要发现评述

段天璟

2022年，是中国考古学新百年的第一个年头。肩负“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上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使命的中国史前考古，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取得了大量重要收获。考古学的中国道路是由我国考古新发现引出的考古新认识不断铺就而成的。在中国考古学新百年的开始，考古工作者们突出“问题导向”，秉持“课题意识”，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中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大量精彩纷呈的新发现，树立了新坐标，显示着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新起点。

研究百万年人类史的新证据

中国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这一论断再次被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和文化证据所证明。2022年5月18日，在汉江北岸的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距“鄖县人”1号头骨发现地点33米远处，紧邻1、2号头骨出土地点的B发掘区，发现了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的“鄖县人”3号头骨及其伴生的石核、石片和搬入石料等石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这一天，恰为“鄖县人”1号头骨发现整33年。

与先前发现的“鄖县人”1、2号头骨化石相比，3号头骨保存得更加完好，直立人形态特点更加明确，是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成为古人类演化研究关键环节和重要时间节点上的重大发现。在学堂梁子遗址C、E区，还发现有晚至旧石器时代较晚阶段的石器。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年代跨度长、遗存内涵好、研究价值高，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以来的人类史提供了重要新证据。

考察上万年文化史的新发现

我国东濒渤海、西至河定的广大区域属苏秉琦先生概括的面向海洋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和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分别位于“面向海洋”文化区的东部和北边，均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遗存面貌，呈现出新今一万多年以来处于这一广大区域内的先民们以制造陶器、农业革命等方式改造自然和创造文化的生动图景。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和农业起源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上万年文化史研究中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地处海岱地区腹地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红烧土、石、骨、蚌、陶等遗存的年代被确认为距今1.1~1.5万年左右。引人注目的是，赵家徐姚遗址揭示出了400余平方米的红烧土。发掘者认为，该遗址至少包括了显品字形分布的3座火塘，周围发现有1000余件遗物。距今万年以前，先民们用火的行为虽已常见，但遗址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早期陶片的现象引人注目。发掘团队在这“数平方千米”范围内的“冲积扇加积过程中发现大面积、多烬次红烧土堆积”，并进行了遗址周边的景观重建、堆积形成、埋藏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揭示内陆国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生业方式、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参考。

位于内蒙古高原南缘、坝上地区的四台遗址诉说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北方地区”距今约1万年左右至仰韶时代早期的文化变迁。四台遗址第一、二组遗存流行压印、折线和刻划纹，筒形罐上的“之”字纹似为“竖压横排”。压印纹和刻划纹在河北易县北福地一期乙类遗存亦有流行。虽然二者的相对年代和遗系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明确，但二者存在的密切关系毋庸置疑。第三组出土的筒形罐、石磨盘、石磨棒等在磁山文化中也有发现。第四、五组饰“麻点纹”的筒形罐和尖圜底器不断显示出来自辽阔的北方地区的文化传统。四台遗址表述了在内蒙古高原南缘附近地区，自距今万年前后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到面向海洋的磁山文化产生，及其后的裕民文化等北方文化传入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复杂历程。

探索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新资料

张忠培先生曾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等区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居民的文化交流加速且规模扩大的同时，跨进了文明的门槛。安徽含山凌家滩、甘肃庆阳南佐等遗址的发现，呈现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精彩瞬间。

凌家滩遗址素以其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闻名。2020年至2022年出土的“龙首形”玉器、大型玉璜、玉梳形器、“鸟轮形”玉器和数量较多的成套石钺，昭示着凌家滩文化居民“祀与戎”的意识与行为。在凌家滩遗址以往的发掘工作中，发现过祭坛、祭祀坑、积石圈、墓葬、红烧土等类型的遗迹。考古工作把揭示遗址聚落布局的视角融入研究课题。发掘者在大型红烧土遗迹底部发现了建筑遗迹，见有内填红烧土的基槽、柱洞，并初步认为“与其西侧区域共同组成一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遗存”。一方面，红烧土、建筑遗迹及“西侧区域”三者间的关系及其在凌家滩文化中的地位的发展阶段值得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为解决“寻找与墓地相匹配的生活区遗存”的研究目标提供了重要资料。还有，祭祀坑西侧外围发现“可能通往墓葬祭祀区”的半环状石子路，坑内发现大量经过大火高温焚烧的石钺、玉石器和陶器等现象，为“活化历史场景”提供了重要依据。凌家滩揭露出“口宽45米、底宽25米、自深2米”的外壕，不仅丰富了对遗址布局的认识，更使人们对凌家滩文化居民的社会组织、生产能力、工艺技术等方面留下深刻印象。

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揭示出了仰韶时代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大型聚落遗址，发现的“九台”、墙沟和“官城”等大型建筑遗迹显示出黄河上游先民们罕见的强大组织能力。南佐遗址发现的九座大型夯土台基以及环绕台基的环壕区域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足见其规模巨大。2021、2022年共发掘了1600平方米，在面积约3600平方米的“官城”中揭示出的面积约720平方米的主殿F1，面积大、保存好、迹象丰富。发掘者指出，F1由前厅和殿堂组成，东、西两侧各有一侧室，墙体采用版筑而成，使用了土坯、红砖、白灰等建筑材料。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同属陇东南地区的秦安大地湾大型房址F901亦呈现出“中轴对称”“前堂后殿”的布局风格，但F901的面积小了不少。还有，南佐遗址出土“数以百万粒”的炭化稻米的来源问题，F2出土成组的彩陶平底瓶、陶罐及白陶、黑陶、绿松石珠高等级遗物引发的思考，为学界进一步深入考察黄河上游与周边区域的关系揭开了冰山一角；更让我们虔发自觉地产生继续深入到田野中“动手动脚找东西”，上下求索寻证据、讲好黄河故事，深入考察中华早期文明的渴望。

当前的夏时期考古研究越发地显示出“研究文明、文化表述”的特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陕西西安太平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等发现展现了晋、陕、豫地区与夏时期考古研究相关的最新成果，体现着考古工作者“以物论史”的艰苦努力。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西隔黄河与陕北石峁遗址相望，向东隔吕梁山与忻定盆地的游邀遗址相邻。碧村遗址存在龙山时代、“龙山文化之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夏代早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三个阶段。笔者曾对石峁与碧村遗址的文化遗存进行过比较并指出，碧村遗址龙山时代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永兴店文化早、中期；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碧村遗存共见陕北地区与忻定盆地文化因素。在此背景下碧村遗址发生了一系列文化变迁：自龙山时代的小玉梁建造土构房址，到夏代早期在城墙圪垛地点修建包括两道瓮城的双重城防设施，最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封堵城门，瓮城转变为生活空间。可见，与石峁遗址城“倚角之势”的碧村遗址处于山西、陕北和河套地区诸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深入探讨碧村遗址和其所处的吕梁地区的文化构成、与周边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等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窥探龙山时代至夏时期在苏秉琦先生所指的“Y”字形地带的西北方向上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址呈现出“万国林立”局面的动因。

龙山时代至夏早期，在南流黄河西侧的渭河谷地是客省庄文化的领地。陕西西安太平遗址展现了客省庄文化的大型聚落形态。太平遗址出土的高脖单把扁足宗，遗址的年代下限进入了夏纪年。与石峁和碧村不同，太平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保存在由环壕围成的两个聚落区域。聚落内发现的地面式、地穴或半地穴式、窑洞式以及“两居室与一院落的半地穴式建筑组合”等形态多样的房址，显示出居民建筑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建造不同类型房址的居民所能动用人力物力的差异。太平遗址出土了各类玉器和玉璧芯、玉料和祭祀、卜骨等遗存，暗示着太平遗址的居民中“匠人”和“巫觋”的存在。太平遗址小麦等植物遗存的发现，为考察黄河中游小麦的传播问题提供了距今四千多年的证据。这些发现都提示我们，要深入获取太平遗址蕴藏的更多信息，仍需将遗存置于“时、空、物、人”的维度上开展大量研究工作。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时期考古研究最核心的遗址之一。二里头遗址都邑多网格式布局的发现，是典型的“问题导向”式田野考古工作案例。在21世纪初，据“井”字形道路的发现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基本布局，发掘者根据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均发现有垣围护的现象提出“其他区域外侧是否有围墙、布局和演变情况”等问题，发现了“井”字形道路上宫西路与宫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发掘了道路旁的部分宫城城西墙和南墙及其东南角和作坊区的西北角，继而揭示出二里头遗址自南向北排列于宫西路和宫东路之间，以宫南路、宫北路为界的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且有城垣以及部分相关道路，从而总结出二里头遗址“宫城居中、是贵族区、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情形逐渐明晰，学界不禁对二里头遗址具体还有多少“网格”没被发现，各“网格”区域的形成时序、兴废变迁、相互关系等更多问题充满了期待。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葬、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及周边遗存的年代分属商代早期和晚期，分别展现了早商时期晋南地区不同等级墓葬的特征和晚商时期殷墟王陵布局的重要迹象。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是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的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2022年，揭露出属于商代早期的大、中、小三个等级的墓葬，为探索早商时期对铜矿资源的控制及其与周边文化和人群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公布的资料来看，大、中型墓葬体现出的商系传统较浓厚，小型墓似存在土著文化特征。发掘者还指出，墓葬“另有少量北方文化因素”。由于铜是当时最重要的资源，西吴壁遗址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战略地位。对西吴壁遗址墓葬等遗存的全面揭露和综合研究，无疑将为考察夏、商王朝管理、开发、利用铜矿的各种问题不断提供重要资料。

2021年至2022年，对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及周边遗存进行的工作，亦凸显了“问题导向”的田野考古工作思路。拟解决的问题有“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等。发掘团队在洹河北岸勘探出了早于战国的南北向干道的遗迹，发现并解剖了分别围绕东区和西区大墓的两条围沟，年代均为商代晚期，发掘者称其为围绕陵园的“隍壕”。从“殷墟王陵总图”上看，在东围沟西部和西围沟东部似各有一个的缺口，两缺口位置相对，二条围沟南部还各有一个缺口。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对商王陵园布局的认识。《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于是，这两条围沟或可称为“兆沟”；同时，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考古学之所以能够“从已知求未知”，“殷鉴”后世，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展示的皆是各种精彩，每年入围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的项目负责人尽是不同的考古工作者。但相同的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身上都闪耀着中国考古人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工作热情和求真务实、肯灯黄卷的探索精神。向2022年中国考古的每一项新发现和每一位考古人致敬！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新实证

董新林

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考古工作者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落实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的22项考古工作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11项历史时期考古成果中，唐代以后的项目有6项，既有中原地区的新成果，也有边疆地区的新发现，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证。

东京开封府城是北宋时期的首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都城，是开放式街巷布局的典范。北宋东京城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同时又地处黄泛区，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因此，北宋东京开封府城内的任何一项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成果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州桥是北宋东京城的水陆交通枢纽，是位于东京城南向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本次入选的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的考古发掘项目，揭示了东京城及大运河曾经的繁华和壮美。这是继外城顺天门遗址之后，考古学者第二次对北宋东京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学术价值重要。一方面揭露出明代州桥为砖石混筑的单孔拱桥，桥面宽30米，南北跨度为25.4米，两侧展出雕栏。在此基础上，发掘者推测北宋州桥为柱梁平桥。这为探讨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清理了州桥东侧的宽约25~28米的大运河汴河段的河道，并发现河道南北两岸均有巨幅的祥瑞石雕壁画，长约23.2、高约3.3米。这为研究北宋雕刻美术史等提供了重要新资料。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州桥的营造基础是否还有残存，确实需要精耕细作地考古发掘去探寻，这毕竟是最为重要的学术目标。

本次入选的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考古成果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若从东晋太宁元年置永嘉郡（公元323年）算起，今年恰是温州建城1700年。温州是5个宋代市舶务之一，是7个元朝市舶司之一，无疑是宋元时期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考古学者在几处基建工地揭露了古城瓮城、水陆城门、水门桥、城外道路、作坊、水井、河驳岸、江堤、码头、木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和沉船等遗迹，以及成吨的各类瓷器等遗物。这些考古遗存保存好，古港遗址设施较为完备，构成温州古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确实是一处十分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从城市考古视角看，再现了温州古城北城门外“北埠”港口码头局部的历史场景。虽然是冰山一角，但也算是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重要发现。从海上丝绸之路考古视角看，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码头、埠头、干栏式建筑、沉船等保存状况之好，码头要素之多，是迄今国内独一无二的考古发现。这些新成果无疑是海丝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海丝申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学术支撑。从文化遗产保护视角看，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是温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将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让位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我们注意到，朔门古港遗址从北宋到明清，甚至民国时期，时间跨度很大。其中宋元时期是温州古港的最重要阶段。但是目前发掘者似乎还没有明确宋元时期温州古港的遗迹构成，缺少对发掘区域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总平面布局的辨析和确认。这或许是未来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

汉人世侯是蒙古国和元代初期较为特殊且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张荣是蒙古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汉军万户，是地位显赫的汉人世侯，被追封为济南王。本次入围的山东济南张荣家族墓地是国内迄今发现的级别最高、陵园结构较清楚、文字资料最丰富的蒙元时期贵族墓地。墓地已发现32座墓葬，分砖筑或石筑类屋式墓（14座）和土洞墓（18座）两类。根据出土器物、张荣神道碑和子孙谱碑等和文献资料推定，墓地约从蒙古国晚期持续到元代晚期。张荣墓（M83）的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壁画之丰富在已知蒙元墓中首屈一指。其前后双门楼、八墓室结构，以及其后门楼和M79门楼设置墓书“堂号”斗形匾等都是重要的新资料。墓地共出土青花瓷器、铜镜、镇墓石、陶俑等随葬品500余件（组）；地表有石碑、龙纹碑首、扇屏碑座、石翁仲、石羊等石刻，是研究蒙元时期丧葬制度的重要新资料。

西藏、新疆和宁夏三个自治区入围的三项考古新发现，为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实证。

温江多遗址位于西藏拉萨市曲水县，海拔3600米。温江多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之一。遗存集中分布在吞香拉康围墙内，东西约240米，南北约280米。整体布局为四塔一殿，与桑耶寺相近，即在吞香拉康的四角，建四座大型佛塔以及大塔之间的小塔基，西部中段有石龟铁碑座，中部和北部还有石块遗迹等。在中部吞香拉康南、北、西侧，发现有不同层位的土石建筑基础及祭祀坑。该区域应为原温江多宫及“温江多誓愿祖拉康”的核心建筑。四角大塔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公元8世纪后期。西南塔东侧装藏坑内出土大量11至12世纪的塔形擦擦。西部的花岗岩龟趺碑座长2.38米，是目前所见吐蕃龟趺座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遗址出土带釉瓦当、板瓦、琉璃砖等遗物带有明显的唐文化特征；而佛塔、建筑基址周边配置祭祀性的遗物坑等则反映了吐蕃本土文化的特点。这是首次对吐蕃时期高等级的窝宫和佛寺建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为研究公元7至9世纪吐蕃与中原唐王朝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材料，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实证。女考古学者常年坚持在西藏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是值得敬佩的，期待对佛教遗址布局和沿革的认识能在精细化发掘中更好地体现。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奇台县县城东北，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学者推定唐朝墩古城是唐朝北庭都护府下辖的蒲类县县治，始建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历经高昌回鹘和西辽时期，于元末废弃。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西、南、北三面城墙呈直线修筑，东墙沿水磨河岸山地自然地势修筑。在城址东墙中部发现一处斜坡和门道结构的城门址。发掘者指出城内存在南北向中轴线，佛寺、景教寺院等主要建筑均位于轴线之上。而我们注意到佛寺和景教寺院都是坐西朝东的布局，而且目前发现的东门址大体居中。唐朝墩古城规划是否一度以东向为尊，是值得以后的考古工作给予关注的。此城内的佛寺和景教寺院南北并列，而且还有其罗马风格的公共浴场，体现了唐朝墩古城在高昌回鹘时期独特的规划理念和城市风貌，是历史时期考古重要的新发现。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发现，确实印证了自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见证了唐朝政府对于西域的有效管辖。

西夏的制瓷业发展一直为陶瓷学界所关注。以往多以灵武窑别花梢或黑釉瓷器作为西夏瓷业的典型代表。而苏峪口窑址精细白瓷的发现改变了学者的认知，是陶瓷考古十分重要的新发现。苏峪口窑遗址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中缸窑子。考古学者目前揭露了包括两座马蹄形窑炉在内的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出土大量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多件匣钵上“戴帽”官字款，推定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或为“官窑”。发掘者认为以该窑址为代表的诸窑场，在承袭北方传统窑业技术菁华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镇湖田窑等窑先进的窑业技术和审美趣向，从而创造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贺兰窑。在窑场周围发现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遗迹。尤其是瓷土矿、石英矿与煤矿等资源在窑址区同时发现，在我国陶瓷考古上尚属首次。苏峪口瓷窑址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其复杂的窑业面貌反映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折射出两宋时期南北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仅要有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新认知，而且更应体现在考古发掘水平的高质量上。已然获奖或入围的22项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都十分惹人注目，精彩纷呈，但是一些项目在考古发掘精细化和考古资料科学整理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期望科学、翔实、精细化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让我们的考古新发现更精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